

关于深化客家研究的思考

蒋炳钊等著

中化炎黄
文化研究会 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燕京国际文化艺术研究会
编

总 序

客家是汉民族中一支重要民系。据统计，全世界客家总人口约有八千万，其中一千多万散布在海外，占华侨、华人总数三分之一。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客家从中原不断向南迁徙，曾经对长江流域、华南地区的开发，对侨居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们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兼容并蓄了其他优秀的外来文化，创造了丰富多采而又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这是万紫千红的炎黄文化大百花园中一朵璀璨的奇葩！

“客家文丛”是一套以研究客家民系源流、社会经济、语言、文字、民俗、文化、心理状态、民系意识等为主的学术性丛书，也包括客家人新写的其它著作。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弘扬客家文化，来弘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炎黄文化。

目前，全国与全世界正在形成一股客家学热，愿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这股热浪推波助澜！

1992年11月于北京

客家文丛编委会

主任：关世雄

副主任：何锡全 杨国昌 叶扬 李公天

陈展超 黄浪华 王棠 钟颖科

赠清剑英图书馆惠存借阅

蔡心

2011年金秋

目 录

关于深化客家研究的思考	蒋炳钊 (1)
略论客研究的基本问题	叶扬 (10)
客家何许人也	叶扬 (19)
关于客家先民第二次迁移运动的质疑	叶扬 (26)
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及其变化	罗英祥 (30)
关于客家血统问题的思考	罗远 (37)
族谱简论——兼谈对客家研究的作用	林善珂 (43)
论汀州都市在客家民系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	李文生、张鸿祥 (47)
客籍人与赣州古瓷窑烧造初探	张嗣介 (55)
晚清客家社会与太平天国革命——兼论客家传统文化与太平天国	叶志如 (58)
近代客家名人黄遵宪与儒学	陈其泰 (68)
从客家杰出人物看客家精神	黄建大 (74)
客家话	黄雪贞 (78)
客家山歌与古典诗词语	金帆 (82)
客家人生育繁衍意识初探	刘锦云 (87)
客家人崇尚孝敬父母	黄书雄、刘锦云 (92)
客家居处方式探源之一 ——客家聚族而居的中原大家族制定	黎虎 (97)
客家民俗探源二题	黎虎 (102)
田心屯军声，给我们什么启示	张克明 (105)
从闽西客家传统饮食文娱习俗看客家先民的开拓能力与革命精神	涂祥生 (108)
惠州：独特的客家文化景观	刘玄恩 (112)
客家华侨华人	卢海斌 (117)
海外客属社团述略	巫秋玉 (124)
访孙中山祖籍孙屋排	邓国祥 (136)
附录： 燕京国际文化艺术研究会章程	(138)
燕京国际文化艺术研究会成员名单	(140)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简介、中心成员名单	(143)

关于深化客家研究的思考

蒋炳钊

江西省赣南中华客家研究会拟于近期创办《客家源》新刊物，编辑部来信约我谈谈对当前客家研究的一些意见，盛情难却。我是被这股热卷进来的一个新兵，过去对客家接触不多，更谈不上研究，但是我了解到，经过近年来的努力，客家研究得到空前的发展，目前正在向纵深的方向前进，如何使这一业绩更加辉煌，这是大家所期望，也是摆在客家研究者面前的思考课题。冒昧地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既是自己的思考，也希望大家共同探讨，并借此对研究会的厚意表示感谢，对新刊物的诞生表示祝贺！

一、客家研究的现实意义

当前，在学术界掀起一股研究客家的热潮，北京、上海以及客属省、地都先后建立了各种客家研究机构或社团组织，召开了国际、国内各种学术讨论会或恳谈会，并出版刊物和文集。设在香港的客属组织——崇正总会于去年9月资助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首次“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会上

还成立了“国际客家学学会”，会址设在中文大学。最近，在香港又创办了“国际客家学研究基金会”，其宗旨：“考证客家源流，发扬中华民族客家族群文化，增进客家崇正族群认识与自信”；“支持国际客家研究会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奖励有关中华民族客家族群文化著作”；“支持兴办中华民族的客家族群文化研究机构”兴办教育事业及筹建客家文物馆；兴办奖学金奖励客家崇正人士后代学术研究”。由此可见，客家研究活动已推上国际学术舞台，为有这样学术环境和气氛，我由衷表示高兴，这对推动客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发挥重要作用。

客家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如果从清光绪温仲和《嘉应州志》算起，已有一个世纪左右时间。三十年代是一次高潮，最突出成就是客家研究前辈罗香林教授1933年出版《客家研究导论》，集前40多年研究成果，同时研究者除客家学者外，还有一些非客籍的知名学者，如顾颉刚、罗常培、李济元、潘光旦等教授也参与倡导客家研究。建国以后，由于众所周的原因，民族学、人类

学一度处于停滞阶段，客家研究也大受影响，而在港台的学者，又有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1950）和陈运栋《客家人》（1970）等专著出版（1987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刊印《客家源流考》在大陆发行）。相比之下，大陆学者对客家研究比港台学者要落后。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科学迎来了春天，学术活动异常活跃，各种学术社团象雨后春笋般在全国遍地的开花，并走上健康发展道路。这为客家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1987年深圳大学中国客家研究会成立，揭开了客家研究热潮的序幕，随后各地先后成立各种客家研究机构和社团组织。从全国来说，客家研究组织成立较晚，但后来居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客家的祖籍地在大陆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又有部分客家向海内外各地迁徙，据研究，目前我国9个省区有客家人聚居，境外有67个国家和地区有客籍华人，全球客家人总人数达9610万左右^①。近一亿客家人，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人数之多，分布地域之广，这是我国其它民系难以相比。客家研究热潮的掀起与改革开放关系密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客家地区发生深刻的变化，许多海外客家人陆续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寻根问祖，溯本正源。这种乡情、亲情之深厚是难予言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升华所显示出的强大凝聚力。这些从海外回的客家后裔，他们的祖先大都是明清时期从大陆移居去的，他们对家乡既眷恋，但又陌生，尤其是对家乡的历史，包括了他们祖先迁徙的历史，有一种迫切要求了解的心理态势，这就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机遇。

在海外的客家人，他们都是经过几代

人的艰苦奋斗，有的在异国他乡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的还提出，“亚洲四小龙”的龙头不少是客家人；还有一些是在国际政治舞台和经济舞台上影响的人物，显示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他们为了报效祖国，促进家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进行投资，或提供信息，这种爱国爱家的崇高品质得到人们的尊敬，并成为一股催人向上的时代气息。

有鉴于此，深入开展客家研究，对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繁荣学术研究以及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客家族群的凝聚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海内外文化交流，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是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础理论的建设，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而且关系着这门学科未来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对客家研究，应该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其中也有一些已涉及到基础理论研究。过去客家研究者，有的把客家冠以“客族”；有的则论证客家“亦非汉种”，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则把客家定为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在《客家源流考》又提出民系形成的三要素：“按民系形成，实基于外缘、天截和内演三种重要和作用。”“所谓外缘，是指各个比邻而居的民族相互之间接触和影响”；“所谓天截，是指各种民族因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所谓内演，是指民族内部的演化”。^②这是客家研究进一步深化的体现，也是理论建设的初步尝试。现在又进一步提出“客家学”这个命题，吴泽教授关于《建立客家学刍议》一文作了一些阐述，是有启发性的。这也是客家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敦煌学、泉州学等等新的名称出现，都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其

用意很明确,客家学的提出,对推进客家研究是有积极意义。

“客家学”提出,必然伴随着上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探讨,作为学术名称的“客家学”它的含义、对象、范围究竟是什么?这既是一个理论,又与研究实际与研究方法很大相关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扩大了客家研究范围,它与传统的研究范围有了区别。客家研究发展到现在,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归属如何划定,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传统学科分类,如从文化人类学学科观点,客家只是当作一个社区或族群看待,;如从民族学角度研究,客家可视为中国民族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从历史学科观点出发,它又具有明显的地方史的特点。在当前,提出“客家学”作为一种发展方向,未尝不可,那么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就不能仅仅限定在客家人本身,它必须包括当地的民族史,地方史等等内容,必须拓宽思路,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客家是中原汉人南迁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内形成的汉族一支民系,这就表明客家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地域)的特点。那么现在闽粤赣三省的汉人都自认其祖先来自中原,他们客家人的先民来源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这一区域内才被称为客家,而在这三省的其它地区则不被称为客家,这是为什么?如果按民系来划分,不论在宋以后出现的越海系(江浙系)、湘赣系、闽粤系(福老系)、南海系(两广本地系)还是闽粤赣系(客家系),如果再细分,还可分为若干方言区。这些不方言区,其实同客家一样都可以称这为汉族中一支民系。这些民系的形成,都是由中原入迁的汉人与当地土著民族结合而成的。

怎样确定一个民系,以及民系是怎样形成的,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它的重要性。罗先生最早提出民系形成“三个要素”,

最近吴泽先生认为客家形成也必须以民族形成“四大要素”理论为标志,即共同的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以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据,深入细致地研究客家民系这四大要素的形成,发展及其与汉民族共同体中诸共同要素的相互关系,进而科学地分析客家先人的南迁过程及客家民系的形成,这是客家学学科的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③我认为不论是“三要素”或“四要素”都是民系形成的重要条件,首先必须具有共同的地域,在共同的生态环境生活中、交往,创造出共同的语言以及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风俗习惯等),但是民系与民族还是有区别,民族的形成也是多元的,在我国国内少数民族,他们的在形成民族之时,四大要素大致已经具备。随着生产力发展割断了原始时代血缘脐带,从血缘关系扩大到地缘关系,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国家。民系一般指汉民族入迁于少数民区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共同体。因此探讨客家民系的形成,既要研究中原汉人入迁的历史,同时要研究当地土著名族的历史,更重要的还要深入研究这批汉人如何同当地土著民族结合的历史,也就是彼此间文化的采借与涵化的过程。

何谓客家?这说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在理解上往往概念不清,突出的地表现在关于客家来源与客家形成、客家先民与客家混同的现象。一个民系的来源和形成是两个不同概念,客家先民的入迁并不等于客家就已经形成,他们刚迁入时,他们的身份还是汉族。因此,如果仅仅理解客家是汉族中一支民系,还没有说明客家文化的本质。我是赞同这样一种意见,客家文化是指他们既保留中原文化特征,又吸收了当地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形成的一支不同于汉族又别于当地民族的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新的人们共同体。居于这个认识,就

比较容易理解今日的客家，它不是单纯的入迁的中原汉人的自身繁衍，同样是经过不断同化当地土著民族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故客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原入迁的汉族与当地土著民族溶合的过程，二者是同步进行的，因而其形成便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必须经过一段较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古代东南地区为百越民族居住区，如今这区域内形成的各个民系，大都经历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

关于客家形成的问题

在当前客家研究中，对于客家的名称、来源和形成，发表了许多文章，尤其对于客家何时开始形成，这是一个客家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在每一本大著中都有重要篇幅介绍。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主要意见：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最早提出：“客家这个民系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鄙意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罗幹青先生认为：“鄙意客家先民，其南徙虽肇自东晋，然其形成特殊的系统则在五代以后。”④邓迅之先生：“客家这个系统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⑤陈运栋《客家人》一书认为：“五胡乱华直至唐末黄巢之乱以后，客家先民避难迁徙到闽粤赣的三角地带，经过五代纷争及宋王朝的统一中国，客家民系才由其他民系的演化而自成一系。”最近吴炳奎先生又提出：“经过较长期考察，我认为在南朝客家民系就已经形成。”⑥

上述的这些观点，除了别持六朝外，大都主张北宋为客家形成的历史时期，根据罗香林先生关于客家迁徙的五个时期的考证，客家先民入迁闽粤赣三省交界地是起自唐末至北宋，在诸多大作中虽未作详细的论述。但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他们大都是

以客家名称来源于宋代的“客户”而作出这一推断的。陈运栋先生说的和很明白，在黄巢之乱以前，“客家民系尚未形成”，是因为“客家名称尚未确立”，宋太祖统一中国，客家民系自成一系，“客家名称，也就在这个时期宣告确立。”

这里我们姑且不从理论上分析它的不足之处，仅从民系形成与名称之间关系谈一点意见。民系（民族）名称出现与民系形成有密切关系，但不可能是同时，名称往往出现在后。最早提出客家名称来源于宋代的“客户”，首推清代嘉应州（今梅州）人温仲和，他在《嘉应州志》云：“然以余观之……可知南宋以前土著之少，而汀、赣客民侨寓之多，故《太平寰宇记》记载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也，而《元丰九域志》载梅州户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则是宋初至元末不及百年，客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且浮十之一二矣。……《元史·地理志》载，梅州仅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五，主客之数已无可稽考。”“主客之名，疑始于宋初户口册，故《寰宇记》、《九域志》所载，户皆分主客，其后屡经丧乱，主愈弱，客愈强。至于无初，大致无虑皆客。《主史》后载亦不分主客。疑其时客家之名已成无主之非客矣。殊不知当时所谓主者，其土音有异于客否，而今皆客话，人亦概称为客家，并无所谓主者。今所编方言，即客话也。”⑦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等书均赞同此说，《客有源流考》又反客户上推至晋元帝“给客制度”的诏书，他说：“至于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展转南徙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云：“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是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

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陈运栋《客家人》一书对“给客制度”又作了分析，他说：“客家名称的由来，虽然出自晋元帝‘给客制度’的诏书，但是这里所说的‘客’，应是广义上的‘客’，而不是单纯指今日客家人的‘客’，这种广义的‘客’一部分演化为‘越海系’，一部分演化为‘湘赣系’，各派演化之后各有各的专有名称宋以后，越海、闽海、湘赣、南海各系已经形成，初虽以‘客’，然因长久客居以后，已不自知其为客，倒变化‘反客为主’了。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他们便宋以后由其它地区南迁的汉人称之为‘客’了。因此，客家的由来，必定是在各个民系形成之后。”⑧罗陈等先生虽然把客家之“客”又上推至晋代，但主张客家之称来自宋代客户的观点并没有改变。

客家之称来源于“客户”之说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认为“客家”与“客户”并没有直接关系，如从字面上看，“客户”之称并不是始于宋代，《晋书·王恂传》已有客户记载，“魏民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唐代也有主客户。说明主客户这一名称是全国性，并不是梅州地区所独有的，因而把客户附会于梅州客家，显然不当。其次，从中国历史考察，宋代将乡村的编户齐民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主要是以有无田产等生产资料为依据，是向政府纳税服役划分的。主户是指有土地的税户，与官府直接发生关系，凡是有田产缴纳两税的称“主户”，亦称“有产税户”；客户则是无地的佃农，依附于主户，与官府无直接关系，没有田产不缴纳两税的称“客户”，亦称“无税户”。很显然，把“客家”与“客户”等同起来是不当的。我国历史上区分主客户标准不是按居民是土著或是外来的，而是按占有土地的而言。张卫东先生《论客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已指出“温、罗二位都把

主客之分与土客之别混为一谈，这就犯了知识性的错误。”

宋代的史书有“客户”，但没有出现“客家”名称。客家之称究竟出现于何时，它又是怎样使用命名的。温仲和《嘉应州志》方言篇曾使用“客家”一词，文曰：“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远、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由以下各州县人迁移他县者所在皆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藉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说客话也，大埔林达泉著《客说》，谓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所据多硗瘠，其语言多含中原之音韵。”从这一记载得到启示，何以称“客家”，首先是广州人对粤东嘉应州各县说一种共同土音的这一群体的专称，以别于说广府话的群体，讲广州方言的民系自认为是道地的广东人，以土著自居，把自己的方言称为正音，认为粤东说的是土语，称之为土话，土著皆以客称之”，正是这个原因。语言是民系（民族）最能表现其特点的外在特征，故被人们称之为人类社会“活的化石”。以至现在仍称讲客话的人为客家人。故此，“客”是相对“主”而言。民系的划分，人们常以语言为标准，这不无道理。

这里只说到客家来源于客户之说的疑问之处。清代已出现了“客家”一词，但不能理解客家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客家是怎样形成的，共同语言的形成是一个重要因素，罗先生《客家源流考》也指出：“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话而与其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福建西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北部，为基本住地”。故这一地区被称为纯客家县。客话是怎样形成的，语言学者

的看法是：“粤东粤北客家住地原先畬族居住，客家移入后，有一段客畬杂居的时期。可以推测，客家方言与畬族语言曾经起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作用。”^⑨“（客家）到达广东东部（主要是今梅县地区）定居的一批，多与当年畬胞为邻，由于交往的需要就吸收了一些畬胞的实用语汇，并凭自己带来的汉族文化优势，把它融合过来，难怪有人把客话误认为‘蛮语’^⑩。文内所谓客家方言，从严格意义上说应是汉语。这里已道出客家形成过程中表现在语言方面需有一个与当地畬族语言溶合过程。

上面说过，客家形成的一重要条件，必须是入迁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汉人和当地土著民族经过一段文化涵化过程，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才可能出现客家这个民系。因而不能把刚入迁于该地区的汉人便称之为客家，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客家先民。所以探讨客家形成问题，首先必须对何谓客家，予以界定，取得共识，才能有共同语言。

唐宋时期，居住闽粤赣交界地的住民，即今畬族，这在学术界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说客家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等历史条件下形成，因此它的形成必然是与他们开发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地以和畬族的历史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畬族名称最早见于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漳州谕畬》，文曰：“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蜒、在漳曰畬。两畬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畬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南宋出现的“畬民”其分布范围除福建的漳州、汀州外，还包括了与之相邻的广东潮州和江西南部的赣州地区即今闽粤三省交界地是畬族历史上的了聚居区。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又称潮州的畬民为“峯”，“峯”广东

俗字，与畬互通，是指相同的一个民族。

畬族区内历史上受到中原两支汉人入迁的影响，这对畬族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表现在部分畬族离开原住地而向闽东、浙南等地迁徙，发展新了的聚居区，故畬族历史上的聚居区和现在分布区明显不同，其次在原聚居区畬族大部分被入迁的汉人同化，成为闽粤（福老系）和客家两个方言区（民系）。这两个民系的形成都是中原汉人入迁于畬族地区，经过两族文化相互采借和涵化而形成的，现将两地情况作个简单介绍，对探讨和理解客家形成也许有帮助。

唐总章二年（669），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出“朝议大夫统岭南行军总管事”陈政，“率府兵三千六百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从其号令，前往七闽百粤绥安县地方，相视山源，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荒，莫皇恩于绝域。”唐军的到来，“泉、潮间蛮僚啸乱”，立即引畬民武装反抗。“几经交锋”“群蛮来侵，自以众寡不敌，退守九龙山，奏请益兵。”唐军被打败，唐王朝得到陈政讨救兵消息，立即又派其兄陈敏、陈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敏、敷二人在途中死去，后由其母魏氏“带领其众入闽，乃进师屯御梁山之云雾镇。”仪凤二年（677）陈政病死，子陈之光“带领其从”，双方斗争仍在剧烈地进行，在“诛之难于屡诛，徙之难于屡徙”的情况下，垂拱二年（686），陈之光上疏朝廷，在闽增建“一州于泉、潮间，以控岭表。”漳州郡治建立，陈之光出任刺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可是畬族人民反抗斗争并未止息。睿宗景云二年（711）十一月，又爆发了一次由三十年前被陈之光镇压的雷万兴、苗自成他们的儿子和蓝奉高等人领导的大规模的起义，“之光闻报，遽率轻骑御之，援兵后至，为贼将蓝奉高刃所伤而卒。”^⑪唐王朝以“岭南多故”，又命其子陈响“代州事”。陈

氏四世守漳，达百余年之久，唐王朝为了强化对该地区的统治，又将大部分将士长期留下来，强迫与当地的畬族妇女与之通婚，他们的后代繁衍为今漳州部分县市的一部分汉族居民。

由此可见，漳、潮地区的汉、畬民族关系，直到南宋时期尚没有出现大规模溶合的迹象，相反地民族界线尚很分明，《漳州谕畬》一文才会出笼，宋理宗景定二年（1262）“由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士诛货，稍龙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密腊、虎革、猿皮之类。畬人不堪，于弗省，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这时在漳、潮爆发畬民的起义，并向统治中心要地漳州挺进，“群盗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危矣”，统治者感到愕然，“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由此可见，自唐初唐军入漳，置郡治，直至南宋的这次畬民起义，封建统治者在畬区已直接统治达593年，畬族的民族意识还如此之强烈。这说明民族间相互溶合，尤其是土著民族被汉化是要经过一段相当长久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的。

闽粤赣交界地区的畬民，接受汉族封建直接统治较晚，比如汀州，是唐开元21年（733）才设置，它是福建封建郡治设最晚的一个州。这是由于这里是一片山区，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生计方式较为落后，又是少数民族居住地，“汀、七闽穷处也”。“郡之北，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到”。故在汀州“造治之初，氏砍大树千余，树皆山都所居，天远地芒，又足妖怪，榛、《》如是，几疑非人所居”。^⑫由于人口稀少，故在建州时，福州长吏唐循忠建议从福州、广州和潮州等地移入三千户。

汀州接壤和潮州和虔州的情况与汀州也大致雷同。粤东地区，晋立义安郡，隋开皇十一年于义安县立潮州，大业二年罢州为义安郡，武德四年复为潮州，辖海阳、潮阳、程乡、三县。唐代的潮州，共辖地包括

今梅州各县。赣南地区，晋立南康郡，隋罢南康郡为虔州，大业三年虔州复置南康郡，武德五年（622）复置虔州，领赣、南康、信丰、大庾、雩、都，虔化、安远等七县。虽然汀州、潮州和虔州的设治有早晚，但行使封建直接统治都在隋唐时期，唐代的汀州是福建社会经济发展最滞后的一个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蛮僚”（即今畬族先民）聚居区，而且还居住一种“裸身”的古老民族，“山都木客”，而这种古老民族正集中居住在汀州、虔州和潮州这一范围的大山中。韩愈被贬潮州刺史时，对他们的单立一身、居蛮夷之地曾颇有感慨地说：“（潮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气，日夕发作……所处又极远恶……死亡无日。单立一身……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⑬

客家先民是避战乱南迁，不是被迫的武装移民，而且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历史动荡时期，因而只能选择偏远山区寻找落脚点。这批入迁移的客家先民与漳州地区的武装移民不同，因而他们的迁徙是逐步的，规模不会很大，人口也不会很多，因此客家先民刚入迁时，“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应指先民一笔才注）所据地多硗瘠”，林达泉《客说》这个说法应该是合乎事实。

从漳、汀两地汉人入迁畬区的历史考察，有着共性的特点，但差异性也很明显，其性表现在唐代的畬区民族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汉人的迁入，使得过去是“苗人散处之乡”，变为“汉僚杂处”，畬、汉民族开始杂居。不同点最突出的，两地入迁的汉人都是从中原迁入，漳州地区是采用武装移民，人数众多，而且一开始就以统治民族的面目出现，甚至有部分将士与当地畬族妇女通婚而长期繁衍下来，入迁汀州的客家先民，包括虔州、潮州地区都是处于被统治地位。唐代对西南和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是采用羁縻统治，起用当地

首领实行“以夷制夷”统治策略，而在汀、虔、潮等州则直接由政府派官统治，所以这批客家先民与当地畬族同样受封建统治。可以想象，在漳州被统治五百年之久的畬族，在南宋时期还是旗帜鲜明地掀起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民族意识仍然很浓厚，民族间的界限还很清楚（当然不排除已有部分产生了相互同化），而居住在闽粤赣交界地畬族怎能在宋代就被溶合为客家，由此说明，推断客家在北宋已经形成是缺乏根据的。

汉人入迁和封建郡治设置，把封建生产关系移植到畬区，汉文化的推广，这在客观上对畬族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客家先民入迁，为该地区注入新鲜血液，他们带来较先进的汉文化，有些还是“衣冠之辈”。尽管是这样，民系的形成还是需要一段发展的时间。罗香林先生认为：“民族民系的形成，实可说不受年代的迟早的限制，古时有无数的民族民系，近今亦有无数的民族民系，；文教高的，历阶多的，活力大的，在相当条件下，固可成为民族或民系……故欲论某种民族的或民系的优秀与否，只能就其文教的高低，历阶的多少，活力之大小衡之，无庸牵涉其年代。欲论某种民族民系形成的年代，只须就其人们团体属性的赋予或变化诸事实或迹象，求之”^①对罗先生意见，我们不敢苟同，究其原因，也就是对民系的形成这一基本理论理解有不同，罗先生只注意到这支文教高、历阶多、活力大的汉族移民，他们经过五代纷争到宋太祖统一中国的这个“变化诸事实或迹象，”故“求之”，得出北宋统一即是客家形成的标志。这也许是他的民族形成“无庸牵涉其年代”观点，说得具体些，民系形成不必经过什么发展变化的时间。唐末五代才入迁的部分汉人，至北宋统一就变成客家，这可能吗？

综观我国东南民族史，自秦汉以后，汉

人迁入“与百越杂处”，民族关系开始变化。同时随着封建郡县的设置与扩大以及汉人不断入迁，使得历史上原住民百越各族在历史上逐渐消失，之后，又出现的一些新的民族（民系）。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民族间的相互同化是客观存在的，有汉族被少数民族同化成为少数民族，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这是因为汉族文化较高，落后民族在与先进民族接触时，在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往往被先进民族所同化。这就是为什么闽粤赣三省原来住民都是少数民族，如今却发展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并由此形成各种不同民系的历史原因。

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手段。文化变迁总的趋势是向上的，是朝着每个时代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客家民系形成，就是代表较为先进汉文化同化当地大部分土著民族畬族文化的结果。现在南方的汉文化中同中原汉文化有着诸多不同特点，尤其是在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这种深层的文化无不吸收了原来当地民族的习俗。“入乡随俗”，这是广为流传的民间谚语，即反映刚入迁的汉人，必然受到当地民族习俗的影响，这从现在的客文化中都可找出其中的含有畬文化的因素。所以客家的形成必须经过一段汉畬文化的交融与洽合，这个时间不可能在两宋时代。客家形成是个复杂的问题，根据畬族历史发展变化分析，客家形成可能始于元代，开成明代，清代是客家发展壮大以及向外迁徙的重要历史时期，限于篇幅，将另文探述。

注

①朱洪《广东畬族研究》。

②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39页。

③吴泽《建立客家学台议》、《客家学研究》第二辑。

④⑤邓迅之《客家源流研究》台湾元明出版社第136页、137页。

⑥吴炳奎《客家源流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2年第3期

⑦温仲和《嘉应州志》卷7方言。

⑧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41—42页。陈运栋《客家人》第12页。

⑨《现代汉语方言》第152页。

⑩陈宏文《关于客家方言前途初探》、《客家研究》第

一辑。

⑪以上未见出处，均见薛凝度《云宵厅志》卷11《官绩》陈光圣。

⑫杨澜《临汀汇考》卷一建置。

⑬《新唐书·韩愈传》。

⑭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39—40页

客家源流考

罗香林

（原载《客家研究》第1期）

客家源流考，为客家研究之基础，亦为客家研究之关键。

一、客家源流考之意义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二、客家源流考之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三、客家源流考之方法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四、客家源流考之结论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五、客家源流考之意义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六、客家源流考之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七、客家源流考之方法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八、客家源流考之结论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九、客家源流考之意义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十、客家源流考之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十一、客家源流考之方法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十二、客家源流考之结论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十三、客家源流考之意义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十四、客家源流考之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十五、客家源流考之方法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十六、客家源流考之结论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十七、客家源流考之意义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十八、客家源流考之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十九、客家源流考之方法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二十、客家源流考之结论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客家源流考之结论，为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意义，在于明了客家之来源，及其迁徙之经过。

客家源流考之材料，可分为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

客家源流考之方法，可分为文献法与实物法。

略论客家研究的基本问题

叶 扬

客家是汉族一个具有自己特性的部分，客家先民是中原地区的汉族人，经多次南徙定居于闽粤赣湘边山区的群体。它较多地保存了古汉族的语言、习俗和文化，又融合了当地居民的特性，经过长期的自然发展形成具有自己的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习俗和心理素质的一支汉族群体。对这支群体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初，其缘由是在东莞、博罗境内的当地居民和客人的械斗。当时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的教师徐旭曾先生在 1808 年对其学生讲了客家人的来源、语言和风俗。其学生把听讲笔记整理出来收进和平县的《徐氏族谱》成为最早的研究客家的文字记述。^①以后，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首领多数是客家人，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骨干力量又是客家人。客家人活跃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革命斗争的舞台上，为世人瞩目。从此引起中外著名学者和传教士研究客家问题的兴趣。1850 年到 1904 年间，估计有 30 多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用赞赏或诋毁的言词去论述客家人的历史、语言、习俗和其它。^②著名学者罗香林教授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在本世纪 30 年

代以来撰写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等著作。他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客观的历史考证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把客家研究推向到新高度。

80 年代以来。为了振兴中华、弘扬炎黄文化、完成祖国统一、繁荣祖国经济，又掀起研究客家的热潮。从有关资料看：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学者和学术团体都较为重视客家问题的研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梅州等地区也纷纷组成研究客家问题的学术团体。

近年，海内外研究客家问题的学者各抒己见，写出许多高质量的作品，但也有可商榷的观点。笔者本着“疑义相与析”的愿望，选择几个问题的分歧论点。加以剖析，就教于同行；敬希批评指正。

一、“客家称谓来自‘客户’”不要轻意否定

客家人为什么称客家？它的科学根据是什么？是客家研究的基本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以往学者有多种不同意见。罗香林教授系统地研究了中华民族的迁移史，考察客家先

民的南徙进程根据《南齐书·州郡志》记载,认为:“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③这就意味着客家人是对当地居民而言为外来户或外来人。罗氏对客家人的界定,被较多人所接受,影响也较大。

但是,有些学者对罗氏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有“严重失误”,是把“主客之分与土客之别混为一谈,犯了知识性的错误。”③-1这种异议是值得商榷的,其理由有如下四点:

第一、“客户”与“主户”在户籍上是相互对称的概念,有多种含义。据《辞海》的解释:主户是“别于客户而言,成为流民,谓地方原有之民户也”。客户是“别于主户而言,谓外籍来附之户”。④后来,《辞海》新版本的解释客户则有二种含义。即一是指由外地迁徙来的人户;另一是指汉魏以来在封建剥削和土地兼并下,广大农民流亡各地,成为“流民”。“流民”为官僚地主门阀豪族荫占后,被称为佃客、浮客、荫户、包荫户等……唐宋时户籍中并有主户、客户区别。客户大抵为无地佃农。宋元之际,客户名称完全消失。⑤这就说明:在户籍管理上称主户或客户的标准有多种,不是一种以“是否占有土地”的标准。诚然,户籍上登记的客户,既含有失去土地的农民或佃农,也含有外地迁徙而来的人户。这样,就不能否定在户籍上登记为客户客家先民是指外来户或外来人的称谓。

第二、土与客有分别,但又有联系。这里所谓分别,即土是指该地区原有的居民,客是指该地区外来的居民。所谓联系是指土与客杂居、交往、通婚,经过长期相处的融合,到那时没有土客之别而“混”在一起了。历史上客家人与畲族人相处的事实,足以说明这论断的科学性。闽粤赣过境山区是今日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也是昔日畲族人聚居

地。据记载:公元7世纪时,畲族人已经是这些地区的主户,而客家先民迁入该地区是在公元10世纪唐末,更多是在宋元交替际。就是说这些山区的主户是畲族人,客户是客家先民。时至今日,闽粤赣边境山区的畲民已无多了,但是遗留下来的畲族人居住过的带有畲字的地名,却很多。据闽西南六个县的《地名录》记载:带有畲字或“斜”字(客家话把畲读作斜)的地名就有138处。其中永定县有两个地名最能说明问题:一个是湖雷乡的“客祖斜”,另一个堂堡乡“客斜坑”。前者是说明客家先民迁来之前,该地的土著居民是畲族,也是户籍上登记的“主户”。后者是说明客家先民迁来之后,与该地土著民畲族人杂居交往以致融合,没有土客之别了,“客斜坑”成训融合一起的见证。这事实足以说明罗氏认为:“客家居地虽说尚有无数的主户,然而新种(客户)一入,旧种(主户)日衰,主户的言语日为客语所排驱,主户的苗裔亦渐渐为客家所同化”(括号内的注释是原引者加进户的一引者⑥)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对此所作异议的论据,只是从《嘉应州志·方言》中引述《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梅州和其他各地的户籍登记数字重新排列提出异议。它写道:“若说‘客户’是‘客家’,90年间,增加了10.929户,那么,各地的主户即罗、温二位所说的‘土著’增加了55.749户,是怎么冒出来的?”⑦其实,持异议者的疑问。如果对登记户口的册籍,即户籍作些历史考察,并对“客户”的认识有全面的理解,就不会有疑问的。须知最初户籍的编户之所以分主户和客户两类,是登记户口的流动,迁入迁出,新迁久住事项的需要。到了唐朝中期,人口迁移频繁,社会动乱,户籍失修。宋朝立国以后,为了交纳身丁税和其他赋税、徭役的需要重订户籍,把编户的主户和客户的含义重新规定。凡占有土地和资产者编为主户,又依据占有

多少不同分为上主户和下主户,其中一至三等占有土地从几顷到上百顷的是上主户,作为缴纳赋税和科派力役的依据;四等户占有少量土地是自耕家,五等户占有更少土地是半自耕农,他们编为下主户都要向官府纳税和服徭役。凡侨寓外地的小工商业者,全无土地靠租种土地为生的佃农编为客户又称无产税户,要向官府纳身丁税,向地主纳地租。可见,宋朝户籍没有排斥侨寓外地居民编为客户。到了宋末元初之际,因社会动乱,情况变化,客户之称便完全消失。了解户籍沿革有助于认识宋太宗年间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和宋神宗年间撰写的《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主户和客户的变动情况。宋太宗到宋神宗的90年间,一般来说是较为安定的,人口迁移不多,户籍册上的原客户因长期无迁移变化,或因土地占有变化,在新编户时被改为主户了。再因新迁进和客户比原客户改为主户的数目少,这就显得户籍册上的主户多于客户。在唐朝,《唐会要》记载:“开元十八年敕诸户籍三年一造”。不论前朝规定是否贯彻执行到后代,但从宋太宗到宋神宗统治期间的户籍肯定会登记过若干次,主户和客户的编户肯定有变动。持异议者称:“其(主户)绝对增长值竟是客户增长值的5倍多”正是反映宋朝90年来的盛世,人口迁移不多和土地占有变化的事实,不宜据此否定罗香林的判断。

第三、罗香林认为客家称谓来自客户的“客”,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罗氏在《客家研究导论》里考定客家界说认为:客家名称起于宋朝户籍册的“主客之别”。客家是民间的通称。1950年罗氏发表《客家源流考》,依据《南齐书·州郡志》记载申明客家的“客”字来由于东晋元帝诏书所定的“给客制度”。罗氏的引文是“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现查对《南齐书·州郡

志》罗氏的引文是作了删节,这给人一个错觉认为,晋元帝是治理失去户籍而庇护于大姓的荫客、佃客、部曲等南渡流民。其实通读全文并非如此,而是会叙述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侨置南兖州,寄治广陵。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把南兖州寄治改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又把南兖州寄治迁回广陵的经过。《晋书·地理志》也作如是记载:“惠帝之末,兖州阖境沦没石勒。是时遗黎南渡,元帝侨置兖州,寄居京口。明帝以希|誉为刺史,寄居广陵,后改为南兖州。”又云:“永嘉之乱,元帝渡江之后,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可见,罗氏的引文原意应是,晋元帝侨立南兖州以安置从兖州南流的“遗黎”,安置在侨州、郡、县的“遗黎”不仅有南渡流民,也有南渡士族。再者,《南齐书·州郡志》所称晋元帝诏书所定“给客制度”,设置侨州、郡、县,究其主旨不是为着南渡流民,而是安抚南渡士族。侨寓在侨州郡县的“遗黎”,通称为寄居他乡的“侨人”。《隋书食货志》正名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谓之侨人”。同是“侨人”,士族与流民其待遇截然不同。出身流民的“侨人”毫无权利。他们只有依士族享有的“私附”特权,在大姓户主的庇护下不上“黄籍”,即不上普通民众的户籍册,得到逃避赋税和徭役的好处。出身士族的“侨人”有继续为官,不纳赋税,不出徭役,还有“挟藏户口,以为私附”的巨大特权。士族“侨人”享有特权正说明侨置州、郡县,诏定“给客制度”是为了依靠士族制度,以巩固政权的主旨,同时也说明“给客制度”是安置寄居他乡之人的用意。所以,罗氏认为:“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不失为有一定的史实根据。

第四“宋朝户籍册的主户专称没有士族的含义。唐朝中期士族势力已经极大削弱，唐末裘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一些地区消灭了士族地主，士族的部曲、荫客、佃客、奴婢得到解放，士族制度逐步消失，土地占有方式不断变动，原订户籍已失效用。宋朝立国以后重订户籍，主户和客户两类编户，再不依据土著和客籍，而以土地资产的有无来划分，作为征收赋税和科派徭役的依据。具体的划分编户，如上所述已与前朝截然不同。但是，对罗氏观点持异议者，以宋朝户籍编户的论据、论述晋朝“衣冠南渡”。认为，“南渡之衣冠在北方时为主户，到了南方侨居地，置予安家乐业，仍为主户——成为客家。但非‘客户’”。并且认为“中原的主户（士族）与客户（流民）同时南迁……主户仍是主户，客户仍是客户。”这里且不论指出，客家先民在晋朝南徙是士族与流民同时南迁的正确论点。但以户籍上的主户专称与南渡之衣冠士族相联姻，则是苍白无力，难于说服他人的论点。

二、客家先民的南徙是避西晋战乱

客家先民的南徙“始机”在何时？是客家群体形成的始源问题，也是客家研究的基本问题。目前至少有两种说法：一是东晋南渡，另一是始于秦代。前者出自罗氏的《客家源流考》。他从考证客家八个氏族家谱记载的各自先人南徙史实，并对证正史与方志认为：“客家先民的南徙，实以东晋南渡为始机”，“客家先民的南徙是属东晋民族大迁移的第二支派”。⑧后者出自《梅州客家简说》，它写道“梅州客家先民来到梅州，最早始于秦代”。⑨这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现在先看“东晋南渡为始机”说，是否妥当。

第一、家谱和史志记载的史实年代，多数在西晋，少数在东晋。其中多数作这样的记载：“衣冠南徙”是在“永嘉之际”或

“五胡乱华，永嘉沦覆”；只有少数记载：“东晋末造，避乱入闽”。所谓“衣冠南徙”是泛指晋朝统治集团中的高级士族和中下级士族的一部分，从黄河流域各州郡南向长江、淮河流域迁移。所谓“永嘉之际”，永嘉是西晋怀帝的年号，从公元307年到公元312年共6年期间。所谓“永嘉沦覆”是指永嘉7年（公元312年）匈奴人刘曜、羯族石勒联合攻进洛阳，俘晋怀帝、杀西晋官民三万余人，烧宫室民房，洛阳化为灰烬，因而史称“永嘉沦覆”。公元313年晋怀帝被杀，同年4月，晋宗室在长安拥立司马邺为晋愍帝，号称建兴元年，至公元316年即建兴4年，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委曲求全“乘羊车肉袒出降”，第二年在汉国受尽耻辱后被杀，西晋从此灭亡。可见，“五胡乱华、永嘉沦覆”非指西晋覆灭。既然如此，“永嘉之际”，“衣冠南徙”的“始机”应在西晋期间中原地区的西晋“衣冠”因避战乱，向南迁移的史实。《纲鑑》对此有所记述，现记录如下，以资证实：“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琊王睿（那时司马睿未称晋元帝而称其封爵——引者）收其英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百六掾。（掾属一种官职，有106人授给官职——引者）刁协、卡、壶、陈、颀、庾亮、甘卓、周访、陶侃皆与焉。⑩至若少数家谱记载客家先民的南徙“在东晋末造”，这与“东晋南渡为始机”的说法，是一致的，不必再说了。

第二、客家先民南徙“始机”的情况极为复杂。从时间说：有的始在西晋，有的始在东晋，不能简单地说“东晋南渡。从动机说：有的避“五胡乱华”中的匈奴和羯族豪酋之乱，有的避“八王混战”之乱，不能简单归结为“因边疆部族内徙或侵寇而引起的中华民族内地人民的迁移”；⑪有的不是为了避乱，而是其他动因。从地区说：有的渡